

「仰高山，俯流水」——論李漁詩詞中的仕途政治矛盾觀

魏琛琳*

摘要：崇禎十二年（1639），李漁鄉試失利，鎩羽而歸；崇禎十五年（1642），他再次參加考試，不料遭遇警報中途折返。此後，李漁不再應舉。他先是回到蘭溪夏李村建造伊山別業，毅然改走「人間大隱」之道；後又攜全家遷往杭州（1649），開始了其賣文為生、極度商業化的後半生。以往研究認為，李漁放棄應舉之後的生活十分稱心如意、志得意滿，但事實上，無論是在伊山別業隱居期間，還是舉家遷往杭州之後，其內在的真實感受和外在的刻意言說都不盡相同，兩相碰撞表現為一種揮之不去的矛盾，體現着作為特殊時期歷史見證者和應對者的自覺。本文從李漁個性心理的「矛盾性」入手，反駁目前學術界認為李漁棄舉後甘於平淡，悠然自得的觀點，務求更全面地探討李漁對仕途和隱逸兩種生活方式所呈現的矛盾態度。

關鍵詞：李漁；人生選擇；個性心理；矛盾

一. 引言

《論語·泰伯》篇載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¹《孟子·盡心上》篇載孟子曰「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²《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載，老子曾對孔子說「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³《荀子·儒效》篇有「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⁴《莊子·天地》篇云：「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⁵ 以上文章所提倡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乃是傳統中國文人所獨有的特殊人文生態。張仲謀曾指出，中國傳統的處世模式「以出與處

* 魏琛琳，西安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師。

1. 程樹德著，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540。
2. 焦循著，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891。
3.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140。
4. 荀況著；王先謙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38。
5. 王叔岷：《莊子校詮》（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年），頁430。

（仕與隱）為基本命題，以兼濟為最高理想，以保身為最低限度。它既強調了士人的社會責任，也照顧到保全自我與人格獨立的低層次需要，可以說已經涵蓋了馬斯洛心理學所提出的各個需要層次，因此千百年來，儘管時移世易，這個人生的基本模式一直沒有變。」⁶「雖然它是由儒家學派提出來的，而事實上可視為早期士人的普遍觀念……兼濟和退隱以對立互補的方式，構成了人生哲學的雙向價值系統。」⁷他還說過「對於士大夫來說，仕與隱並不是平行的兩條路，而是人生哲學中兩個互補的範疇。」⁸

的確，無論是蘇軾還是王陽明，都曾根據不同時期的時代背景、社會環境、個人的經濟情況、性格特徵、政治理想等做出「出世」或「入世」的政治選擇。「仕」與「隱」彷彿是中國文人非此即彼的人生選擇。然而，在主張「學而優則仕」的中國傳統社會，有多少選擇出世的文人，是心甘情願地走上這一條路的呢？李漁在三次科舉失利後選擇退出政治遊戲，嘗試過隱逸山林、避世不出，最終選擇了賣文、演劇、打抽豐（指假借名義、利用關係向人索取財物）為生這條完全與眾不同的路，並在這條路上走得有色有聲、盈利頗多。他的選擇看似很識時務又頗有自知之明，但實為其消極、無奈之舉。因為無論經濟上取得了何等巨大的回報，都無法彌補李漁內心深處對功名的殷切期盼。李漁這種主觀人生選擇和客觀內心期待之背離，以及由此而生的矛盾心理，或許正是大多出世文人的內心真實寫照。

二. 人生選擇的矛盾：一條積極而又消極的路

1639年夏，李漁赴杭州參加鄉試，落榜而回。當時的李漁雖然認為自己懷才不遇，並因此而終日不歡，但他並沒有放棄。1642年，李漁再次出發參加鄉試，不料中途遇警，只能半路折返。但李漁這次所展現的態度，和第一次鑿羽而歸時很不一樣，他在回家途中寫下〈應試中途聞警歸〉記錄自己的心情，其中有「正爾思家切，歸期天作成。詩書逢喪亂，耕釣俟升平」⁹之句，非但沒有失落，反而認為警報聲正中下懷，因為可以回家耕釣而展露出開朗的心情。不久後他回到蘭溪夏里村隱居起來，放棄了之前「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生活方式。後來，李漁於辛卯年（1651）遷居杭州，毅然走上被時人視為「賤業」的賣文之路，並以旺盛的精力和創新的思維方式連續寫出多部小說、傳奇，其作品以通俗易懂而又獨樹一幟的寫作風格讓人耳目一新，引發大眾的購買狂潮。似乎李漁的人生並沒有被仕途上的挫折影響，反而是因此尋得契機，找到了新的出路。

對於1642年之後放棄應舉的李漁，學術界一般認同伍聯群的理解，認為李漁雖然經過了明末戰亂和凶荒之災，但是「還有一些資材，有妻有妾，仍然過着一種種花養草、

6. 張仲謀：《兼濟與獨善：古代士大夫處世心理剖析》（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頁62。

7. 同上，頁62-63。

8. 同上，頁55。

9. 李漁：《李漁全集》卷3（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94。

賦詩訪友的『人間識字農』的閒適隱逸的生活。」¹⁰ 言下之意，就是這個時期的李漁並沒有太多不快，反而保持了樂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以傳統文人的「出世」來面對命運的不公允，從此淡薄名利。例如沈新林在《話說李漁》中說「此時，李漁的心情十分舒暢，盡情享受田野之趣，山居之樂。他自得其樂，吟詠詩詞五十餘首……」¹¹ 又稱「改朝換代、功名不遂而導致其淡泊名利；立志隱居，是他思想發展的里程碑……」¹² 還說李漁「隱居蘭溪鄉下，耕釣自食，怡然自得，樂不可言，有超然物外之趣。」¹³ 又如馮保善在其《李漁》一書中稱李漁在伊山別業時「很陶醉，在這裏，他種花養草、飲酒賦詩，過着與山水自然為鄰、與天為徒的田園生活」¹⁴，還指出李漁此舉是基於「做山人詩人，游離仕途，在一定程度上避開政治，尋求現實的享樂，追求自然，在詩、書、畫中討生活，這種『詩意』人生的追尋。」¹⁵ 黃果泉在其《雅俗之間——李漁的文化人格與文學思想研究》中稱李漁此時的生活「聃情山水逸趣、向慕耕耘釣月」¹⁶ 鄭雷在其博士論文〈李漁年譜考敘·初編〉中也稱「李漁此際適性任情，得閒居逍遙之樂，為數年來所未曾有。」¹⁷ 以上論述，足以證明學術界認為李漁這一時期的生活舒適愜意，而且自得其樂。

不管是沈新林還是馮保善，他們之所以有以上的看法，除了受到伍聯群的影響，主要還是因為李漁這時期創作的詩詞，充斥着「出世」的意象。他在〈閑〉中表態：「畏看雲出岫，愛學鳥知還。早歲能如此，頭顱正未斑。」¹⁸ 認為自己此時的生活狀態簡直「擅有生之至樂」¹⁹。在1648年寫下的〈伊山別業成寄同社五首〉中，李漁更有「南軒向暖北軒涼，宜夏宜冬此一方。載遍梅竹風冷淡，澆肥蔬蕨飯家常。窗臨水曲琴書潤，人讀《花間》字句香。詩債十年酬未始，擬從今日備奚囊」²⁰ 之句，充分表現出愉快地享受生活的情境。還有「但作人間識字農，為才何必擅雕龍。養雞只為珍殘粒，種橘非緣擬素封。酒少更栽三畝秫，花多添飼一房蜂。貧居不信堪輿改，依舊門前着好峰」²¹ 等句，不但一掃之前科舉失利的鬱悶和失落，不再為塵世名利奔忙，更展現出安心享受

10. 伍聯群：〈覺世稗官筆下的俚巷雜碎事〉，《川東學刊（社會科學版）》第7卷第1期（1997年1月），頁83。

11. 沈新林：《話說李漁》（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17。

12. 同上，頁17-18。

13. 同上，頁18。

14. 馮保善：《李漁》（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4。

15. 同上，頁15。

16. 黃果泉：《雅俗之間——李漁的文化人格與文學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13。

17. 鄭雷：〈李漁年譜考敘·初編〉（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論文，2010年），頁70。

18. 李漁：《李漁全集》卷2，頁100。

19. 《閒情偶寄》中，李漁曾描述自己在伊山別業時的生活：「明朝失政以後，大清革命之先，予絕意浮名，不干寸祿。山居避亂，反以無事為榮。夏不遏客，亦無客至，匪止頭巾不設，並衫履而廢之。或裸處亂荷之中，妻孥覓之不得；或偃臥長松之下，猿鶴過而不知。洗硯石於飛泉，試茗奴以積雪。欲食瓜而瓜生戶外，欲啖果而果落樹頭。可謂極人世之奇聞，擅有生之至樂者矣。」見李漁《李漁全集》卷3，頁318-319。

20. 李漁：《李漁全集》卷2，頁166。

21. 同上卷2，頁166。

平淡閒適生活的態度。在其另一篇鄉居之作〈山居雜詠〉中，他也著意刻畫山居生活之美好，「剩有閒情在，幽居肆討論。選竿留竹杪，蓄杖護梅根。戀樹身同鶴，忘憂我即萱。倦眠花影上，夢壓海棠魂。」²² 描繪自己現下悠閒安逸、自得其樂的生活狀態。又如「半生長蹙額，今日小開顏。綠買田三畝，青賒水一灣。妻孥容我傲，騷酒放春閒。獨喜林泉福，天猶不甚慳。」²³ 看似十分享受這一時期的生活，認為以前的生活經常愁眉不展，而現在總算是過上如意、開心的日子了。在〈憶王孫〉中更有「滿庭書帶一庭蛙，棚上新開枸杞花。童汲清泉自煮茶。不輸他，錦坐珠眠富貴家。」²⁴ 「不期今日此山中，實踐其名住笠翁。聊借垂竿學坐功。放魚鬆，十釣何妨九釣空。」²⁵ 似很能在幽居生活中自得其樂。這就讓一些研究者形成了「李漁此時生活十分安適愜意」且其「十分享受此時的山居生活」之感。不僅如此，他還自稱「笠翁」，自我定位為一個隱居山間、不問世事、頭戴斗笠、一心垂釣的老人，並將自己這段時間的經歷形容為「享列仙之福」²⁶，絲毫不見放棄科舉的鬱悶或不甘。

這種自得其樂的狀態一直持續，即使是後來遷居杭州，李漁也多次在自己的詩詞中表達自己對於棄舉之後人生境況之滿意與自得。他曾寫下「日食五候之鯖，夜宴三公之府」²⁷ 來形容自己在社會上家喻戶曉的局面，《笠翁十種曲》獲評「北里南曲之中，無不知李十郎者」，隨之而來的便是生活條件的改善和社會關係網的織建。憑藉自己的作品，李漁逐漸打入杭州文化圈，通過與圈中知識分子的交往，他逐漸在政界打開知名度。舉例來說，孫治（1619-1683）、陸圻（1614-？）等人積極為李漁寫序、作評，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大力宣傳和推廣李漁作品，替他打響名號，以至於當時很多官員都期待有機會目睹李漁的才華和風采，當面進行交談。這一現象在黃鶴山農為〈玉搔頭〉做的〈序〉中也得到證實，「當途貴游與四方名碩，咸以得交笠翁為快。」²⁸ 就這樣，李漁憑藉自己的創作逐漸和政要建立聯繫，如時任江左布政司的張縉彥（1599-1670）便十分欣賞李漁，還專門提供資金供他刊印、出版自己的作品。

表面上看，李漁選擇的這條路是更為明智和便捷的，他並沒有像蒲松齡等人一樣，陷於科舉考試無功而返的挫敗情緒，抑鬱不得志；也沒有像那些對官位、仕途孜孜以求的傳統文人一樣，滿腹牢騷、難以釋懷。相反，他很快接受了現實，為自己找到了新的出路：退出政治遊戲，開始商業化的後半生，通過賣書、售文等做法，將自己成功變身為一個「開心過小日子」的生意人。此舉雖然與當時傳統知識份子所崇尚的清高道德標準相距甚遠，但他卻為自己創建了一個寬廣而實用的人際關係網，並在與達官貴人的交

22. 同上卷2，頁90。

23. 同上卷2，頁91。

24. 同上卷2，頁387。

25. 同上卷2，頁387。

26. 同上卷3，頁318-319。

27. 同上卷1，頁204。

28. 黃鶴山農：〈玉搔頭序〉，《李漁全集》卷5，頁215。

往過程中賺取了可觀收入，過上了普通布衣之士很難擁有的精緻生活——講究的園林、氣派的居所、精美的飲饌佳餚、身邊妻圍妾繞……他以這種獨特的方式開闢出一條與傳統文人迥異的生活道路。

但從另一方面來講，選擇這種謀生方式的李漁雖然看似遠離「廟堂」，放棄仕途經濟，但其謀生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仰仗達官貴人之庇護，無論是賣藝、表演，還是打抽豐等行為都沒有擺脫對「廟堂中人」的依賴。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從小耳濡目染儒家學說的讀書人，李漁始終未能脫離傳統的思維模式，潛意識中具有難以割捨的人世傾向。因此，筆者認為，這個時期的李漁，只是表面上強作歡笑，內心則一直受到這種人生選擇的困擾。伍聯群等前輩學人所注意到的其詩詞中的悠然自得，不過是李漁為了掩飾內在的空虛而刻意進行的創作而已。這種「口不對心」在李漁的身上漸漸形成了一種揮之不去的「矛盾」，透過細閱其傳世詩文，可以找到以下例證。

如，在寫下「戀樹身同鶴」「梅鶴又相親」的〈山居雜詠〉（五首）中，我們發現李漁還有另一種感歎：「為結山林伴，因疏城市交。田耕新買犢，簷蓋旋誅茅。花繞村為縣，林遮屋是巢。此身無別往，久繫欲成匏。」²⁹ 其中，「久繫欲成匏」借用《論語·陽貨》第十七「佛肸召」節「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³⁰ 語，書寫山居生活的消極影響，認為若一直這樣下去，他終將變成沒有任何用途的「匏瓜」³¹。明確提及「結山林伴」和「絕塵世交」之間的必然聯繫，李漁出世難成的懊惱和糾結便可以想見了。這種心理在〈丁亥守歲〉（1647）一詩中表現得更為明顯：「著述來年少，應慚沒世稱。豈無身後句，難向目前騰。……每逢除夕酒，感慨易為增。」³² 詩中表達的慚愧和擔憂絕非一個決心隱居鄉間之人會有的心態——隱居文人大多生怕被世事牽累，對一切身份、浮名、虛銜等避之惟恐不及，又怎麼可能顧慮隱居之舉會埋沒自己原有的名聲、甚至擔心死後會獲得怎樣的評價呢。怎麼會展現出與鬱鬱不得志、擔心「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的屈原相似的人生感歎呢。由此可見，李漁這一時期雖然選擇了在夏里村隱居，且不止一次說自己樂在其中，但在表面的釋懷和安於平淡的背後，後悔、遺憾、惆悵、不甘之情一直被壓抑、同時也暗地生長着——即使他曾經有過漁樵之志，也缺乏獨善其身的恆心。他無法容忍自己變成毫無用途的「匏瓜」，在寂寞無聞中默默死去。因此，前人稱其淡泊名利、立志隱居之說似有不妥。相反，通過細讀李漁的作品，我們可以發現他這一時期在某些詩詞中描繪出的安逸和自適其實都是表面的，在

29. 李漁：《李漁全集》卷2，頁89。

30. 程樹德著，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206。

31. 《論語·陽貨》中有「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王粲〈登樓賦〉有「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見王粲著，俞紹初點校《王粲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9。王安石〈韓持國見訪〉詩有「余生非匏瓜，於世不無求。」見王安石著，李壁箋注，高克勤點校《王荊文公詩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252。自從孔子用「匏」來發表政治上遭受挫折的感歎，匏便成為了一個有關政治前途的術語；匏瓜也是如此，被用於比喻那些徒勞無功，沒有辦法實現理想抱負的人。

32. 李漁：《李漁全集》卷3，頁103。

其刻畫山居美好生活的背後，渴望出世、求「浮名」、盼世人認可的心理其實從未改變。表、裏的兩相碰撞，在李漁身上表現為一種時隱時現的矛盾。

這一點從李漁希望其作品發揮的社會功效亦可以得到證明。在他的創作中，一方面經常有強調自我修養、品德高尚、人格完美之句，表達對懷瑾握瑜之無暇品格的追求；另一方面無論是其詩文還是哪怕被視為「小道」的戲曲小說，都或隱或現地帶有一種傳「道」的使命感，強調寫作的意義在於勸世諷喻、維護宗教倫理、展現因果報應，是謂「有裨於世道人心」，對合理的社會秩序表達嚮往。是故，讀者總能感受到他內心深處的政治關懷，如「莫道詞人無小補，也將搦管助皇猷」，或至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勸使為善，戒使勿惡，其道無由，故設此種文詞，借優人說法與大眾齊聽。」又如「於嬉笑諷諧之處，包含絕大文章；使忠孝節義之心，得此愈顯。」從這些說法中都可以看出，他希望自己的小說創作能夠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內心並未脫離士大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心理結構，以及在這種心理結構下產生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這種自稱自己不想再參與政治遊戲，表面瀟灑自在，憑才智娛樂他人同時寬慰自己的行為，與其內心深處潛在的「立功」渴望，期待參與政治而不得、未能實現更大抱負的遺憾，雖然未必是他心中最深、但一定是非常難以磨滅的一道傷痕。從這個角度而言，選擇棄舉賣文這條看似積極、便捷之路，實為李漁的消極、無奈之舉。這種主觀人生選擇和客觀潛意識中的內心期待之背離，勢必會形成一種不可避免的矛盾。

三. 內在心理的矛盾：賣文為生的喜悅與仕途未就的苦悶

遷居杭州後的李漁很快便以作品聞名，從一個普通「讀書人」搖身變為知名作家，而且在自產自銷的商業化道路上走得愈發穩健。據前人記載：「笠翁詞曲有盛名于清初，十曲初出，紙貴一時。」³³ 有人甚至推崇他「所制詞曲，為本朝第一」³⁴，此後社會上出現競相上演其劇作的熱潮。范驥（1608~1675）在為〈奈何天〉做的〈序〉中寫道：「予自吳閩過丹陽道中，旅食鳳凰台下，凡遇芳筵雅集，多唱吾友李笠翁傳奇，如〈憐香伴〉、〈風箏誤〉諸曲。而梨園子弟，凡聲容雋逸，舉止便雅者，輒能歌〈意中緣〉，為董、陳二公復開生面。……笠翁天才騷屑，觸手則齊諧、諾皋比肩，搖筆則王實父、貫酸齋接跡。近自湯臨川〈牡丹亭〉、徐文長《四聲猿》以來，斯為絕唱矣。」³⁵ 從這段描述中可見當時藝人「眾口一詞」排練李漁劇作的盛況，並將此舉作為時尚風氣和文人風雅的象徵，李漁在當時的社會知名度和認可度由此可見一斑。值得一提的是，李漁的受眾並不限於梨園歌姬和普通市民大眾，官員亦對其追捧有加：「當

33. 蔣瑞藻：〈毗梨耶市雜記〉，載江竹虛標校《小說考證》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462。

34. 支豐宜：〈曲目新編，題詞〉，載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冊9（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頁133。

35. 范驥：〈意中緣序〉，載李漁《李漁全集》卷4，頁317。

事諸公購得之，如見異書，所至無不虛左前席。」³⁶ 後來，李漁的作品出現了被書商盜版的情況，很多人假借李漁之名出版、販售圖書，這些都說明李漁作品在當時的受歡迎程度，以及他作為一個創作者名號之響亮。

在以創作聞名之後，李漁逐漸拓寬了自己的「業務範圍」。他不僅開始對《水滸》、《金瓶梅》等長篇小說進行評點；還成立了自己的家庭戲班，調教女樂，並開始打抽豐，範圍從南到北，對象從初級官吏到政府要員，從初期為官員潤飾文稿、搬演劇目，到後來編輯文集、幫助設計花園、佈置廳堂等。李漁在整個過程中收穫頗豐³⁷，既賺取了經濟利益，又增加了自己的人脈和社會影響力。他曾把自己此時的生活描述為「混跡公卿大夫間，日食五侯之鯖，夜宴三公之府。」³⁸ 可見他本人對這一階段的成就十分自豪。他還多次在自己的詩詞中形容自己賣文、演劇、打抽豐的巨大收穫，如〈送人遊白下並託寄書〉中有「地主爭來迓，無煩倩友陪」³⁹，又不乏「秦遊頗壯」等語。在個人創作、社會交往和商業經營方面做得如此風生水起，李漁當時的意氣風發和志得意滿便可想而知了。這種情況為李漁帶來極度自信，如他在〈復尤展成先後五札〉中自詡「弟無子健之才之美，而有其捷。方之七步，未甚晚也。」⁴⁰ 還將自己定位為文學創作的「功臣」，自稱「不效美婦一顰，不拈名流一唾，當世耳目為我一新。」⁴¹ 此外，他還多次強調自己的作品比經史創作的意義還要重大，因經史創作「僅可悟儒流」，而無法「為大眾慈航」；甚至提出，憑藉文學創作，自己可以跟那些中舉後出仕做官，為國、民建立功績的人平起平坐，是故他在〈贈施匪莪司城〉中寫下「君蚤立功予立言，相期不朽追前賢。」⁴² 認為自己可以通過與傳統文人截然不同的方式走向人生價值的另一種實現，並聲稱「立言」同樣可以讓他獲得與前賢並肩、名揚千古的機會。

上述這些原因，很容易讓人形成一種錯覺，以為李漁十分滿足於受大眾追捧、作品被搶購一空的情況，志得意滿的他早已把科舉未就的苦悶拋諸腦後了。然而事實與此恰恰相反：首先，賣文為生之路並不總是讓人快樂的；其次，即使賣文為生為李漁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收益和心情上的愉悅，但這種喜悅遠不能夠填補李漁仕途未就的苦悶，他對於仕途功名的憧憬和渴望並沒能隨着賣文為生之路的日益順暢而逐漸減退，而只是被暫時封存在內心之中，偶爾會隱隱流露出來。

具體來說，他一方面自稱「不效美婦一顰，不拈名流一唾，當世耳目，為我一新。」

36. 同上，頁317。

37. 到了後來，基本上整個《資治新書》、《尺牘初征》等書的作者都成了他打抽豐的對象，其交際範圍和交際成果可想而知。

38. 李漁：《李漁全集》卷1，頁204。

39. 同上卷2，頁116。

40. 同上卷1，頁190。

41. 同上卷1，頁164。

42. 同上卷2，頁60。

使數十年來，無一湖上笠翁，不知為世人減幾許談鋒，增多少瞌睡！」⁴³ 志得意滿之情溢於言表；又稱自己「混跡公卿大夫間，日食五侯之鯖，夜宴三公之府。長者車轍，充溢衡門；館閣詩筒，捷於郵置……」⁴⁴，對賣文為生取得的成就十分自豪；但另一方面，他深知賣文、演劇、打抽豐並非體面的謀生方式，甚至在過程中時有身心俱疲、無可奈何之語，如〈次竹馬館〉中「處處愁雲黯，家家敗葉飛。預知今夕夢，不去且言歸。」⁴⁵〈得家書〉中有「遊倦琴書冷，歸遲兒女猜。」⁴⁶〈答吳彥遠述游况蕭索〉中有「到處逢迎好，生來口腹便。不知明日杖，又掛阿誰錢。」⁴⁷〈夜深不寐，聞童子鼾聲〉中有「夜夜難成寐，今宵漏更長。無憂羨童僕，有夢到家鄉。」⁴⁸〈江行阻風〉中有「熟識離家苦，經年事遠遊。只緣貧作祟，致與樂為仇。」⁴⁹「孤舟依岸泊，窮客受風欺。休憩無人信，安危有命知。」⁵⁰〈答家人問楚遊壯否〉中有「詩逋償未了，旅病復相侵。載滿無非月，囊堅不是金。」⁵¹〈和諸友稱觴悉次來韻〉（其二）中形容自己「十日有三聞歎息，一生多半在車船。」⁵² 在其四中坦承「三緘寧敢期多獲，萬苦差能得一歡。」⁵³ 等等，均可見混跡公卿大夫間打抽豐的李漁並非總能碰到「日食五侯之鯖，夜宴三公之府」的優厚待遇，旅途奔波中常有艱辛、潦倒、淒涼之感。

不僅如此，李漁一方面在〈長至日〉中寫下「地氣任從枯管動，名心不復死灰燃」⁵⁴，表態自己早已失去對科舉的熱情，在〈六秩四首〉（其二）中寫下「自知不是濟川材，早棄儒冠辟草萊。」⁵⁵ 又在〈癸卯元日〉中假意暗喜「不才自合逢明主，誤用何能保賤驅」⁵⁶；但另一方面，他深明士大夫傳統對文人的社會期待，因而在〈夢中贈人，止成五句，醒足成之〉中讚陸姓友人「酒德真堪頌，名心老未忘。」⁵⁷ 在〈高山仰止行贈程蕉鹿文宗〉中羨其「先生之道亦猶是，天下誰人不仰止。聖經羽翼出新安，當年賴有程夫子。豈期程後復生程，同在孔子門牆標姓氏。前賢工傳注，後人司文章。驅使文章歸傳注，不教片語落荒唐。」⁵⁸ 也正是因此，他才會在〈過子陵釣台〉中寫下讓

43. 同上卷1，頁164。

44. 同上卷1，頁204。

45. 同上卷2，頁114。

46. 同上卷2，頁115。

47. 同上卷2，頁117。

48. 同上卷2，頁120。

49. 同上卷2，頁122。

50. 同上卷2，頁123。

51. 同上卷2，頁128。

52. 同上卷2，頁187。

53. 同上卷2，頁187。

54. 同上卷2，頁174。

55. 同上卷2，頁185。

56. 同上卷2，頁181。

57. 同上卷2，頁116。

58. 同上卷2，頁71-72。

人忍俊不禁的詩句：「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堪憎。同執綸竿，共披蓑笠，君名何重我何輕！」自認「釣虛名」；在〈旅況〉中發出「為我乏生計，累人輸俸錢。」⁵⁹ 的感慨，在儒士前賢面前感到「形容自愧」、「面目堪憎」，時發「羞作賈」⁶⁰ 等愧悔之語。因此在筆者看來，李漁並不是不屑功名，而是望功名而不得的，求不得便言自己不在乎，以無畏態度面對自己的失敗與不安，〈立春日〉中的那句「烏紗難媚且驕貧」⁶¹ 便是其求而不得之感的不慎流露。這種因仕途未就而產生的矛盾和不甘除了表現在李漁筆下的詩、詞、文創作中，《資治新書》的編纂也可以作為一個旁證幫助說明筆者觀點。

在寫作戲劇、小說取得巨大成就時，李漁轉而編著《資治新書》，這是一本彙編了斷案方法的工具書。若非對體情斷案的喜愛、對政事的熱情，李漁不會花費巨大心力，記錄、整理並詳細評價官員審理案件的全過程，還說希望這本書可以供官員們在斷案時參考。其「用世之心」由此可見一斑⁶²。張道勤也在《資治新書》的點校說明中指出「李漁一生沒有做過官，但不等於沒有用世之心，由其廣搜博訪海內遺牘新篇，分門別類，精心彙編，並對這些文章逐一圈點批評，以抒發一己之見可以看出，他實是一位對政治有熱情、有理想，但懷才不遇的人。」⁶³。

更為明顯的證據是，李漁在《資治新書》卷首作〈詳刑末議〉、〈慎議芻言〉，中有「朝廷既有國治，自當明正典刑。」⁶⁴ 之句，帶有明顯的協助治國口吻；又有「官府政事殷繁，日不暇給，令其破有用之功夫，驗無傷之鬥毆，況有下親驗之事，告者不是害人，害人罪小，害官罪大，即斃諸杖下，彼亦何說之辭！」⁶⁵ 儼然國家政權的代言人，似乎在潛意識中早已將自己視為統治階級的一員。

此外，若對《資治新書》的〈題詞〉和〈序〉加以研究，便更可以發現李漁對政治仕途的期盼和他為走向政途而做出的努力。王曰高在《資治新書》的〈敘言〉中寫道：「笠翁笠翁，假使天老其材，以當大用，將來經世救世諸偉論，一一皆見之設施，所為坐而言，起而見諸行事者，將於他日驗之，知不徒貴洛下之紙而增名山之價矣。」⁶⁶ 不

59. 同上卷2，頁114。

60. 〈凌山人索贈〉：「我羨凌高士，終年少歎嗟。家貧羞作賈，頭白愛簪花。誠子親遊俠，租田與種瓜。菟裘營太早，慮不老煙霞。」見李漁《李漁全集》卷2，頁129。

61. 李漁：《李漁全集》卷2，頁173。

62. 此前有學者認為李漁編寫《資治新書》的目的在於借此機會加強自己和達官貴人的聯繫，但如果只是出於建立和鞏固社交網絡的需要，他可以採用的辦法簡直不勝枚舉，例如選擇以往成功過的、一直以來使用、並引起積極反響的作品類型——帶有感情色彩的書信集，或帶有文學色彩的文學作品集、詩詞酬唱集等似更為妥當，根本無需再花心思對官員審判時的司法案例加以整合。因而，加強與達官貴人之間的聯繫並不能作為這本書撰寫的主要目的。更何況李漁拉攏與權貴的關係多是為了打抽豐，目的在於獲取經濟利益，若只是想要做到這一點，還不如乾脆把精力放在寫作廣受追捧的小說戲曲上，無需繞這麼大的一個圈子。

63. 張道勤：〈點校說明〉，載李漁《李漁全集》卷16，頁1。

64. 李漁：《李漁全集》卷16，頁5。

65. 同上卷16，頁10。

66. 王曰高：〈資治新書敘言〉，載李漁《李漁全集》卷16，頁2。

僅認為李漁有用世之才，並且為他沒能為世所用感到遺憾，明顯是在為李漁鳴不平。又如王仕雲在〈題詞〉中寫：「余乃知學而仕，仕而學，古人一之，今人（按：指李漁）二之也。由是編觀之，政則真政，文則真文，仕則真仕，學則真學……笠翁之有裨於吏治遠矣。」⁶⁷ 王士祿在〈序〉中寫：「……於《禮》有之：士非明義理，備道德，通經學者，不可居治獄之官。笠翁誠有見於此乎？向使操尺寸之柄，得自展其所為文，必大有足觀者。」⁶⁸ 這些話都是在強調李漁有從政、「當大用」的才學，既然從一本《資治新書》便足以看出李漁對吏治的功用，那麼若他有機會入朝為官，必定能夠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作為此書的作者和出版者，李漁允許他們的〈序〉或〈題詞〉等發表出來，足以表明李漁對這些評價的認可。因此，《資治新書》可以看作是李漁本人對於步入仕途這件事的無聲表態，佐證了他對入仕為官其實並沒有對外表現出的那樣無欲無求甚至不屑、排斥。

其實，李漁的朋友們多次在不同場合發表類似言論讚其政見超群、有功於吏治，例如偽齋主人觀《無聲戲》，評之「以為戲可，即以為《春秋》諸傳亦可。」⁶⁹ 極力拔高《無聲戲》對社會的貢獻。杜濬在《連城壁》的序中評李漁「有裨世道不淺」。⁷⁰ 在《合影樓》第一回的眉評中杜濬又稱其「羽翼六經，扶持名教，厥功偉矣。」⁷¹ 郭傳芳在〈慎鸞交〉的〈序〉中說得更為明確：「笠翁當今良吏也，抱實際而躬虛務，無心當世也明矣……予固謂笠翁為當今良吏，惜乎有蘊莫展，而徒使建幟于風雅之壇。」⁷² 黃鶴山農在為〈玉搔頭〉作的〈序〉中更是直接進行感慨：「嗟乎！笠翁有才若此，豈自知匏落今日哉！」⁷³ 這些評論都有明顯的鼓吹之意，很可能是在刻意迎合李漁的心理預期。反過來說，李漁將他們的評論發表出來，也大有借人語敘己情之嫌。否則他不會一再邀請這些願意鼓吹自己應當出仕為官的人幫自己作序，又一直採納暗含這種觀點的言論，將它們刊登在自己作品的卷首。

一方面說自己放棄科舉，另一方面卻在行動上為走向仕途而默默努力，這種「心口不一」的態度在〈五十初度答賀客〉（1660）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窮愁豈復言初度，衰病空勞祝大年。艾不服官今已矣，歲當知命卻茫然。」⁷⁴ 其中的「窮愁豈復言初度」、「艾不服官今已矣」句都可看出，李漁的出仕為官之念其實一直以來都未曾改變，多年來他只是將自己內心深處的渴望自我壓抑、按下不表而已。且李漁這首詩的寫作背景是好友張縉彥因資助出版《無聲戲二集》受到彈劾，所謂的出仕之心「今已矣」

67. 王仕雲：〈資治新書題詞〉，載李漁《李漁全集》卷16，頁5。

68. 王西樵：〈資治新書序〉，載李漁《李漁全集》卷16，頁3。

69. 偽齋主人：〈無聲戲序〉，載李漁《李漁全集》卷8，頁2。

70. 杜濬：〈連城壁序〉，載李漁《李漁全集》卷8，頁247。

71. 杜濬：〈眉評〉，載李漁《李漁全集》卷9，頁14。

72. 郭傳芳：〈慎鸞交序〉，載李漁《李漁全集》卷5，頁420。

73. 黃鶴山農：〈玉搔頭序〉，載李漁《李漁全集》卷5，頁215。

74. 李漁：《李漁全集》，卷2，頁168。

更有可能是受到觸動和驚嚇後的應激反應。反過來講，早前他便已多次宣稱自己不屑從政、放棄為官，可此時又說自己的服官之念到今天才告一段落。因此，這很可能是李漁再一次的自欺欺人、口不對心。多年來的執念恐怕不是輕易就能放棄的。否則，他就不會在之後的日子裏積極輔導自己的兩個兒子寫八股，讓他們努力應試、參與科舉。

由此可見，在遷居杭州之後，李漁表面上保持了積極、正面的態度，多次在自己的詩或給友朋的信中對自己的創作成就進行自我表揚，自豪感頻見筆端，甚至還在強調自身能力和才華的同時對科舉制度進行貶低、對傳統儒士表達不屑，似乎以往科舉失利、無法為官的苦悶早已被李漁自行消解。但實際上，他始終沒能擺脫內心深處對廟堂和仕途的追求與嚮往。

四. 結 論

作為一個受士大夫文化氛圍熏陶的傳統文人，李漁曾有過為官之志，但受限於明清易代之際特殊的社會環境，加之科舉接連失利等因素的影響，他放棄了傳統文人普遍選擇的康莊大道——科舉，先後走上了隱居田園、賣文為生、亦文亦商的道路。雖然他並沒有如傳統文人一般汲汲於功名，但他從未疏離或排斥過主流社會觀念，相反，從小接受儒家教育的他深明社會對士人之期待，不甘於功名無望。

因此，無論是在伊山別業隱居期間，還是在舉家遷往杭州之後，李漁內在的真實感受與外在的刻意言說都不盡相同，兩相碰撞表現為一種揮之不去的矛盾，體現着作為特殊時期歷史見證者和應對者的自覺：在伊山別業時，李漁雖選擇了避世安閒，還在詩文中多次強調隱居生活的閒適自得，但卻不時流露出內心的無聊和寂寞，尤其對自己默默無聞、籍籍無名的處境感到苦悶，表面上的超脫與內心的不甘形成強烈對比；遷居杭州後，李漁雖憑藉自己的文學創作才華一舉成名，但仍對仕途騰達無法忘懷，這表現在他的「口不對心」：一方面志得意滿地大肆宣稱「君早立功予立言，相期不朽追前賢」⁷⁵，認為自己可以通過「立言」的方式與「立功」的前賢殊途同歸，平起平坐；還對傳統文人、功名等加以鄙薄。但另一方面，他卻又在其他詩作中講述自己面對前賢時的自慚形穢，常發愧悔之語，還在老年時全力輔導兒子們寫八股，幫他們求取功名。因而本文認為，在隱居避世、亦文亦商的行為背後，李漁渴望學為公卿、出仕從政的內在心理期待其實從未改變，那些表面上的自我稱讚和自我滿足，更像是無奈之下的自我安慰和自我解嘲。實際上，無論是隱居避世的逍遙自在還是賣文演劇的名利雙收，都無法撫慰他內心望功名而不得的痛苦。換句話說，從小受士大夫思想熏陶的李漁深曉社會對文人的期待，但他科舉失利，入世之志不得舒展，卻又始終未能完全參透，出世難成；即使賣文為生為他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名望，也仍然無法抹消傳統倫理規範在他內心打下的深刻烙印，使其不知何去何從。這種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造成李漁

75. 同上卷2，頁60。

內在心理的矛盾。

這種矛盾表現在李漁的創作中，便是一方面強調自己的悠然自得、志得意滿——或享受現狀，感慨平靜生活之悠閒與可貴；或自我欣賞，為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喜悅與自豪；另一方面卻又無法平息自己留名於世的渴望，亦無法掩飾自己內心求官卻不得的遺憾與不甘。這導致他不時在著作中流露出內心深處的惆悵與無奈，並下意識借各種機會強調自己的滿腔報國志和從政能力。這種自我欣賞又暗含惆悵，自我張揚又倍感失落的矛盾情緒交織、伴隨了他的一生，是故名聲大噪後的李漁即使依靠文學創作為自己贏得了許多聲譽和實際利益，賣文為生的喜悅也仍然沒能沖淡他仕途未就的苦悶——這一點從其留下的詩文、詞曲、給友人的書信中都可以得到證明。

應該說，李漁的表現，是一個在種種原因交織下放棄仕途，但又未能真心看破，在傳統崇尚功名眼光之下心有不甘之人的典型個案。通過分析李漁在不同階段的人生選擇，以及其中潛藏着的內在矛盾，我們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其一，李漁自幼年時期便在母親的引導下樹立學為公卿的人生理想，但不曾想到在科舉受挫、明清易代、社會動蕩、家庭變故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其理想終究化為泡影。在此之後，他先是避世離俗，後是棄舉從商，其間不乏對科舉功名、傳統儒士進行嘲諷與鄙薄，但這些更多的是他為了排解科場失意愁緒的心理平衡之法，學為公卿的人生理想和現實中理想實現無望的矛盾，以及為了化解這種矛盾而進行的自我開解，導致了他對外表達和內心真實想法之間的差異。

其二，這種矛盾的背後，是一種文人無力掙脫的二律背反：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文人的入世之志無法舒展，卻又無力割捨內心對士大夫傳統價值觀的認同，出世難成；即使採取其他方式實現自我的社會價值，就算名利雙收亦仍覺少了些什麼，畢竟受出仕傳統思想熏陶多年的奉儒為官之念，一直在文人心目中佔據着一個獨特而不可被取代的位置，這種求而不得的痛苦、不甘與煎熬是可想而知的，且這種情緒很難被任何來自其他方面的世俗快樂所彌補或者替代。

其三，李漁的矛盾和糾結並不是僅限於他個人的，而是屬於一類人的。這種「矛盾」心理其實是當時許多文人面對現實社會環境時的共同外部表徵。例如陳繼儒（1558-1639）也放棄科舉，終身不仕⁷⁶，當代學者指出，「作為絕意科舉仕途的在野士人，陳繼儒無法延續科舉入仕以修齊治平的文人經世傳統，但經世之心，卻仍未泯滅，故而隱居之時，當地每遇災荒，便利用各種關係，通刺官宦，倡導士紳，救濟災荒，撫恤災民。」⁷⁷ 又如大畫家董其昌（1555-1636）雖然追求仕進，官位甚高，但其「理想就是

76. 陳繼儒和李漁相似的人生經歷，歷來受到學者重視。例如梁春燕有〈陳繼儒與李漁的文化行為比較〉（《渭南師範學院學報》第23卷第4期（2008年7月）），吳艷麗有〈陳繼儒與李漁比較研究〉（《邢台學院學報》第26卷第4期（2011年12月））。

77. 趙楠：〈陳繼儒——晚明士風的一項個案研究〉（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頁39。

做一個世外桃源中人，了無俗事纏身，所以對『花溪漁隱』的題材特別感興趣。」⁷⁸ 陳繼儒曾提及「玄宰（按：董其昌字）每欲買山霽上，作桃源人，以應畫識。」⁷⁹ 他們在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和滿足社會期望之間、在追求世俗的優渥生活條件和秉持內心的高雅疏潔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價值取向之間，在仕與不仕之間，搖擺不定、掙扎徘徊。表現在現實生活中，就是身不由己、言不由衷。

本文以李漁為切入點，對其面對仕途政治時的「自我矛盾性」進行分析，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瞭解李漁的人生選擇和內在心理、啟發我們對這種「矛盾」背後的原因和當時的社會環境進行探索和反思，而且還有助於我們發現當時的文人在實現自我價值和滿足社會期待二者之間的矛盾與猶疑，發掘「戀烏紗」的期待與「神不許」的現實之間的距離與悖論；此外，對個體內在心理和外在表徵之間差異的重視勢必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明清易代時期的士人心態、文化氛圍和社會現實。 □

78. 顏曉軍：〈九峰三泖，白首至交——董其昌與陳繼儒的藝術交遊〉，《美苑》2014年第2期，頁69。

79. 陳繼儒：《妮古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冊118（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頁676。